

李良玉 著

动荡时代的知识分子



中国社会史丛书

中国
社会史丛书

李良玉 著

动荡时代的知识分子

浙江人民出版社

封面设计 池长尧
责任编辑 汪维玲
责任校对 朱晓阳

动荡时代的知识分子

李良玉

*

浙江人民出版社出版
(杭州武林路125号)

浙江新华印刷厂印刷
(杭州环城北路天水桥边)

浙江省新华书店发行

*

开本850×1168 1/32 印张8.125 插页3 字数18万

1990年7月第一版 1990年7月第一次印刷

印数：0,001—4,600

*

ISBN 7-213-00445-X/K·110 定价：3.35 元

60623/16

编 序

历史学是一门古老而又常新的学科，有其自身的规范和功能；与此相观照，以再现过去为本旨的社会史研究的勃兴，体现了当代历史学演进的内在逻辑。

就历史认识的整个过程而言，“在第一条道路上，完整的表象蒸发为抽象的规定；在第二条道路上，抽象的规定在思维行程中导致具体的再现”（马克思语）。由传统史学脱胎而出的社会史研究，正是以其整体史观的新姿，强调对历史“完整的表象”的研究。它既涵盖传统史学的研究领域，更关注社会结构—功能及其运行机制静态和动态的研究，从而进行人类历史景观的模拟复原，使之客观准确地成为检测现代社会的参照。

时下，中国马克思主义的社会史研究尚处在摸索起步阶段，如何展开中国社会史研究，尚有赖于学界同仁的合作努力。为此，我们组织了这套《中国社会史丛书》，希冀其能起到抛砖引玉之效。顾名思义，这套丛书是以整个中国社会史为研究对象的，它涉及社会结构、社会阶层、社会团体、社会思潮、社会问题、社会生活等方面。它对我们今日认识国情，推进社会主义的改革事业将大有助益。

我们深知，仅仅通过这套丛书，决不可能完成中国社会史研究的任务，即使所出的著作能否达到社会史学科所规定的要求，也还有待专家的评判。故此，我们诚恳地期望读者和学者们给予批评指导。

《中国社会史丛书》编委会

目录

1	第一章 维新派知识分子与戊戌思潮
1	第一节 晚清科举知识分子
1	一、时代的震荡
3	二、科举的奴役
6	三、士大夫的传统意识
11	第二节 激进知识分子的出现
11	一、“甲午”刺激
13	二、新思想的闪光
16	三、旧传统
21	四、日本模式
23	第三节 戊戌思潮的兴起和衰落
23	一、戊戌思潮的兴起
28	二、新旧思潮的冲突
33	三、鲜血染红了维新
35	第四节 传统意识的嬗变
35	一、日本的陶冶
38	二、民族主义与民主意识
42	三、道统观的淡化
46	四、国民性批判
51	五、进一步退一步

55	第二章 革命派知识分子与革命思潮
55	第一节 新兴知识阶层的诞生
55	一、新式高等学校的出现
60	二、第一次留学高潮的兴起
64	第二节 维新思潮向反清思潮的过渡
64	一、革命没有超前
68	二、保皇与反清的分野
74	三、留学生的激进化
77	第三节 反清与共和
77	一、反清思潮的高涨
84	二、欧美模式
89	三、社会与思想的追溯
97	第三章 癫狂的革命者与无政府主义思潮
97	第一节 无政府主义思潮的兴起
97	一、反清思想的刺激
100	二、与日本左派的关系
103	三、癫狂的革命者
105	四、追求与放任
108	第二节 无政府主义流入国内
108	一、师复主义
112	二、三无主义
117	第三节 新村变奏曲
117	一、无政府新村与新生活
121	二、新村主义与互助工读
124	三、未来之梦的终结
131	第四章 五四前后的知识分子与社会思潮
131	第一节 新兴知识分子队伍的壮大

131	一、教育事业的发展
139	二、第二次留学高潮
146	第二节 民主科学思潮的兴起
146	一、国粹主义与帝制复辟
150	二、专制立宪论批判
155	三、历史的反思
159	四、全盘反传统主义
165	第三节 民主科学思潮向马克思主义的过渡
165	一、中等知识阶层的崛起
172	二、俄国模式
179	第四节 多元思潮的汇合与冲突
179	一、多元思潮的汇合
186	二、多元思潮的冲突
195	第五章 五四思潮的演化与新中国
195	第一节 民主主义向法西斯主义的蜕变
195	一、畸形的民主观
202	二、领袖至上与政府万能
209	三、重建道统的过程
217	第二节 冒牌的传统意识和三民主义
217	一、日本近代军国主义思潮
223	二、汉奸卖国主义的社会基础
227	三、汉奸理论的透视
235	第三节 近代知识分子的抉择
235	一、马克思主义的传入
239	二、第三国际和俄国的影响
243	三、延安模式的胜利
245	四、民主主义仍然是武器

第一章 维新派知识分子与戊戌思潮

第一节 晚清科举知识分子

一、时代的震荡

一百四十多年前，广东海面上突然响起了英国军舰的炮声。它划破沉寂的中国长空，惊动了北京庄严肃穆的紫禁城。从此，天朝上国的雍容华贵，慢慢地零落以尽。这一段历史，那样地令人难堪，它刺激和折磨中国人的自尊心，至少有一百年之久。

如果我们暂时撇开西方国家对 中国进行殖民掠夺的性质，那么，近代中外冲突的物质条件对比，便是先进的资本主义工业对落后的传统农业的征服。从这个视角上可以看到，近代化这个历史命题，是通过侵略者的枪林弹雨所启示的。先进的中国人对于这个启发，似乎颇得灵感。从魏源的“师夷长技”到轰轰烈烈的洋务运动，不管他们思想上有多少歧异，从物质层面上学习西方是大体一致的。然而，近代中外的不同历史条件，还包括社会制度的优劣这样一个文化意义上最重要的内容。应当承认，中外冲突的结局，显示了资本主义民主制对封建君主制的冲击。这就决定了中国近代化的实质，不仅是资本主义工业化，而且寓含着民主化的深刻要求。也就是说，中国人必须实现从物质生活到精神世界、从社会经济基础到上层建筑的全

盘转换。这是一个崭新的课题。

实际上，中国的厄运，并不能仅仅看成是在近代时空范围内发生的悲剧，通过西方政治文化的比较，可以从更深的层次上揭示这场悲剧的历史原因。西方国家的强大，以人的解放为起点。从意大利文艺复兴开始的人文主义思潮，向中世纪宗教神学发出挑战，培育了近代资本主义的新精神、新思想和新道德。十六世纪中叶哥白尼《天体运行论》的发表，吹响了科学起义的号角，对神学的审判由文学艺术的殿堂移到了科学讲坛。跟着便是资产阶级革命，封建社会土崩瓦解，科学大昌魔术般地使社会经济日新月异，历史以目不暇接的速度飞快前进。而这一切，中国人并不知道。当他们以礼义之邦目空一切的时候，古文明的危机早已酝酿成熟。这突出地表现在宋明理学关于人与伦理关系的本末倒置。宋明理学把传统文化中的封建伦理加以强化，向根本漠视、否定人的价值和个性的极端方向演绎，从而赤裸裸地提出了诸如“人心莫不有知，惟蔽于人欲，则亡天德”、“存天理、灭人欲”那样灭绝人性的口号。这真是儒学的疯狂，本质上它又是中国封建制度走入穷途末路的征兆。中国封建制度在唐代之前，其特点是地方权力向中央集权过渡，唐以后则逐步实现了完全向皇帝个人集中。封建制度的极端专制化，是以士大夫阶层一切批判的勇气、一切个性的要求、一切异己的政治行为的彻底放弃作为条件的。不过，这还不是事情的全部。到了清代，满清统治集团不仅继承了宋明理学和传统封建制度的专制主义精神，更以异族入主中原，千方百计地消灭汉族知识分子的民族意识，这就使历代相沿的思想统治，更打上文字狱的血腥标记而狰狞可怖，知识分子如果还能称作知识阶层，不过以学者的繁琐考据才得以苟延残喘。龚自珍这样泣血锥心地控诉了统治集团对知识分子人格的

暴虐行径：“缪其能忧心，能愤心，能思虑心，能有廉耻心，能无渣渣心。”整个清代中叶都是一片阴霾晦涩、枯燥无味的气氛。因此，如果要追溯中国落后的历史过程，恐怕要从西方人文主义思潮和宋明理学开始。人文主义思潮用人学反对神学，用纵欲主义对抗宗教禁欲主义，用人权反对君权，从而开拓了人的解放、生产力的解放和社会制度变革的辉煌时代。宋明理学则截然相反，用儒教禁锢思想，用禁欲主义消灭人欲，用君权摧残人权，从而大大加剧了中世纪的黑暗。思想、欲望、人权，本质上都是人的价值的体现，如果把中西方文化的区别归结到对人的态度，那么，西方文化发展人的个性，中国文化赞美人的共性；西方文化注重人的外向性，中国文化提倡人的内向性；西方文化追求人的权利，中国文化强调人的义务。这种巨大反差，决定了中国人接受西方文化的影响，比屈服于侵略者的枪炮所引起的社会震颤，还要强烈得多。

二、科举的奴役

在谈到中西文化的时候，应当指出，从近代思想史的角度看，在1898年戊戌变法以前，中国知识分子中当然不乏关心、了解和主张学习西方文化的真知灼见，只不过它们大大缺乏社会思潮所拥有的广阔性和丰富思辨，其实际影响是极其有限的。尽管近代社会发生了急剧倾斜，但是，从整体上看，知识分子对中西文化的撞击和渗透，似乎并未十分及时和敏感地有所认识和感应，至少在1894年甲午战争以前，这个社会阶层没有骚动不安的迹象。这是什么原因？第一，由于中国知识分子对西方文化的心理隔膜。中国文化历来被认为是天下最优秀的文化，他们对儒家典籍以外的东西是不屑一顾的。下面这个事实可以证明这一点：在1898年以前，中国共翻译了大约561种西方

书籍，从出版地区分析，上海出版434种，占77.4%，从译者分析，约有360多种是由外国传教士主持或他们参与译述的，占65.1%。中国知识分子不懂外文，也不需要知道外国的事情。当时传教士译书，大多自己口译，由别人用中文记录下来。第二，由于中国知识分子对科举的执著追求。科举是中国传统的人才选拔制度和教育制度。清代科举制大致沿袭明制，它分为三个层次：（一）秀才。凡读书人必须经过一定考试选拔，录取进入县学、州学或府学，才能得到秀才资格，这是科举的初级功名。考秀才的考试称为童子试，参试者称儒童或童生，录取入学后称为生员，又称庠生，秀才是俗称。（二）举人。由秀才经过乡试取得举人资格是科举中关键的一步。清代乡试三年一次，逢子、午、卯、酉年开科，因在8月举行，故又称秋闱。举人是中级功名，大约有50%的举人可望得到一官半职，跻身官僚阶层。（三）进士。由举人经过会试取得进士资格是决定命运的一步。会试三年一次，逢辰、戌、丑、未年开科，因由礼部主持，称为礼闱，又因在二月举行，又称为春闱。

科举制度不适应中国近代化的历史要求，这表现在两个方面：首先，科举名额限制造成了知识分子出路狭窄。科举的三个层次，秀才、举人和进士都有名额限制。秀才的名额一般是大府20名，大州县15名。举人名额以省为单位，一般大省80—90名，中等省60—70名，小省30—40名，每科全国约录取1200多名，考取进士的更少。从清顺治三年到光绪三十年的258年中，共开112科，取进士26000余名。有人统计，每届投考者总有6000—7000之众，录取率约为3%。这就是说，大约有97%的举人是不可能取得进士功名的。其次，它不可能为社会提供资本主义工业化的新型知识和人才。康有为敏锐地看到了这一点，他指出：“今日四海隸通，列强互竞，欧美之新政新法新学新器

日出曹奏，欧人乃持其汽船、铁路，以贯通大地，囊括宙合，触之者靡，逆之者碎，揉而用之，则与之化同，乃能保全。”^①科举制度反其道而行之，它把中国人重义轻利的传统伦理观念加以恶性发展，“中国文士，专上制艺，即本国之风土人情、兵刑钱谷等事，亦非素习，功令所在，士之工于此者得第，不工于此者即不得第，虽豪杰之士，亦不得不以有用之心力，消磨无用之时文。即字字精工，句句纯熟，试问能以之又安国家乎？不能也。能以之怀柔远人乎？不能也。一旦业成而仕，则又尽弃其所学。呜乎！所学非所用，所用非所学，天下之无谓，至斯极矣”^②。它造成了社会风气颓坏，更直接决定了清朝政府决策部门的昏庸，“有以外部之要，而言澳门在星加坡之外者；若亲贵极藩，问安南在何处？与广西近否？则固然矣。是以割混同江、精奇里江、乌苏里江六千里土地与俄……而中朝若不知之”^③。

科举制度是中国知识分子接受西方文化的严重障碍。这个制度把社会各阶层的人才吸收进入政权，造成人才流向的单一化，知识分子除了彻底依附于这个政权别无他途。公元1652年各地学宫建立的卧碑中说：“朝廷设立学校，选取生员，免其丁粮，厚以廪膳，设学院、学道、学官以教之，各衙门官以礼相待，全要养成贤才，以供朝廷之用。”^④康熙九年礼部题准：“生员如果犯事情重，地方官先报学政，俟黜革后治以应得之罪，若词讼小事，发学责惩，不得视同齐民，一律扑责。”^⑤可见秀才已经能够享受到一定的政治、经济特权。清政府规定，正规科甲

① 《进呈日本变政考序》，《戊戌变法》（三）第8页。

② 郑观应《盛世危言》，《戊戌变法》（一）第50页。

③ 《中国除害议》，《戊戌变法》（三）第123页。

④ 《事例》卷389，《礼部·学校·训士规条》。

⑤ 同上书卷392《优恤诸生》条下。

出身为正途，余为异途，“其由异途出身者，汉人非经保举，汉军非经考试，不得授京官及正印官，所以别流品、严登进”^①。有人统计了清代总督、巡抚一级高级官吏2748人，其中有1031人出身进士；781名侍郎中，约450多人出身进士。通过读书考试可以获得高官厚禄，这在官本位意识浓厚的中国人中，有着巨大的诱惑力。对于那些除了这条道路之外，根本没有其他可能来改变自己社会地位的人们来说，科举更是唯一的指望。有人统计，明清两代的进士，平均有42.9%出身于从未有过功名的家庭，清代约有二分之一以上的生员，出身寒微。有人统计了清代112科会试产生的112名状元的家庭出身，查实有26人出身于父祖两代既无功名又无官职的清寒之家。科举制度保证了中国社会的政治文化一体化，知识分子没有自己的独立人格，不能形成与统治者不同的价值观，这就决定了近代知识分子心安理得地按照固有的生活方式，选择自己的人生道路。

功名意识、经学意识和纲常意识，是科举制度下知识分子的群体意识，代表着他们的价值体系。在这个价值体系没有被动摇之前，他们不可能认识近代民主化的历史任务。

三、士大夫的传统意识

科举知识分子以读书和参加科举考试为获得功名利禄的目的和手段，科举制度必然使他们培养成了不同于社会其他阶层——例如农、工、商，比较独特和稳定的心理素质和思想意识。反过来，通过他们的家庭、亲友、社会活动等等，这种思想意识必然又影响其他阶层，成为支配社会的伦理道德，甚至风俗习惯的规范力量。科举知识分子的思想意识主要表现为

^①《清史稿·选举制》。

功名意识、经学意识和封建纲常意识。

功名意识是科举知识分子最普遍的思想意识。唐代高蟾诗：“天上碧桃和露种，日边红杏倚云栽。芙蓉生在秋江上，不向东风怨未开。”作者对别人登科后平步青云的描写，反衬了自己失落的心态。宋代苏轼词：“长恨此身非我有，何时忘却营营？”流露了士大夫经邦济世的政治抱负无法实现的愤闷。封建时代的启蒙读物中，诸如“万般皆下品，惟有读书高”，“朝为田舍郎，暮登天子堂”，“少小须勤学，文章可立身，满朝朱紫贵，尽是读书人”等等，不独在孩童时期就给读书人指明了奋斗方向，同时又是科举时代的普遍价值观念。明末小说《三刻拍案惊奇》中，有一个以靠替富家子弟找人冒名顶替作枪手为生的恶棍，一个秀才的价格为300两银子，其办法是：“他自去寻有才、有胆、不怕事秀才，用这富家子弟名字进试，180两归做文字的，120两归他。复试时也还是这个人，到进学，却是富家子弟出来，是一个字不做，已是一个秀才了。”^①《儒林外史》所描述范进中举前后人们对其态度的变化，活脱脱地刻划了以功名决定贵贱的世风。它驱使知识分子皓首穷经，至死不移地追之求之。近代思想家薛福成指出，无锡一带有人“年至斑白，犹混迹于童子军中者”^②。据记载，清乾隆四十九年会试，各省举人中有九十岁者一名，八十多岁者二十名，七十多岁者五名。康有为说：“窃计中国人多，最重科第，退以荣于乡，进以仕于朝，其额之窄，其得至难也，诸生有视科第得失为性命者。”^③周恩来同志年轻时曾记载一考生，因屡试不第，气疾而亡，临终前为自己写下一副挽联，说：“疾自何成，都为二字功名，戕我身

① 《三刻拍案惊奇》第294页。

② 《庸庵笔记》卷六。

③ 《清广译日本书派游学折》，《戊戌变法》（二）第223页。

心戕我命；死奚足惜，舍不得两父母，看儿生长看儿亡。”周恩来同志指出：“有清一代科举之毒甚于明代。盖文网日紧，士非由八股以作进身之阶，其道无由。故莘莘学子终日埋首斗室，唧唧吟吟，所希冀者，博得一领青衿，归以娇妻子耀乡里耳。”①陈独秀是戊戌时期进入科举的，1896年考中秀才，次年还到南京参加了江南乡试，他对当年注重功名的社会风尚作了如下惟妙惟肖而又入木三分的叙述，他说：“在那一时代的社会，科举不仅仅是一个虚荣，实已支配了全社会一般人的实际生活，有了功名才能做大官，做大官才能发大财，发了财才能买田置地，盖大屋，做地主，欺压乡民，荣宗耀祖；那时人家生了儿子，恭维他将来做刚白度（即买办）的，还只有上海十里洋场这一块小地方，其余普遍的吉利话，一概是进学，中举，会进士，点状元；婆婆看待媳妇之厚薄，全以儿子有无功名和功名大小为标准，丈夫有功名的，公婆便捧在头上，没有功名的连用人的气都得受；贫苦农民的儿子，举人、进士、状元不用说，连秀才的好梦都不敢做，用尽九牛二虎之力，供给儿子读几年书，好歹能写出百儿八十字，已经算是才子，如果能跟着先生进城过一次考，胡乱写几百字交了卷，那怕第一场就榜上无名，回家去也算得出人头地。穷凶极恶的地主们，对这一家佃户，便另眼看待，所以当时乡间有这样两句流行的谚语：‘去到考场放个屁，也替祖宗争口气’。”②直到五四时期，这种封建思想意识的残余仍然变态地表现在青年知识分子中。冯友兰先生于1915年进入北京大学，他回忆说：“当时的北大，就文科方面说，所讲的已觉不是应科举考试的‘举业’的一套，但是大多

①周恩来《飞飞漫墨》，《敬业学报》第六期1917年6月。

②《实庵自传》，《陈独秀文章选编》下第556—557页。生活·读书·新知1984年6月版。

的学生思想的还是科举的一套，就是说，还是以学校毕业作为取功名利禄的手段，认为学校毕业相当于科举的举人、进士等资格。”^①

经学意识是科举知识分子的知识观念。清代乾隆年间规定，乡试、会试均为三场，首场考四书文，次场考经文，末场考策问。考四书是指《论语》、《大学》、《中庸》、《孟子》。考经文是指五经，为《诗经》、《书经》、《易经》、《礼记》、《春秋》。考策问是指时务政治。科举考试用八股文，其文章结构有一成不变的格式。八股文的开端，必须有破题二句，承题三四句，起讲十句上下，再加领题三四句，然后进入八股。八股是起二股，中二股，后二大股，末小二股，它们中间用出题、过接、落下等形式互相连合。从起讲开始要用“且夫”、“尝思”、“意谓”等语气词模仿四书中人物的口气答卷，谓之代圣人立言。“经术既明，取青紫如拾芥”。反之，如果不把儒家典籍背得滚瓜烂熟，只能名落孙山。康有为指出：科举下“学者所事，学八股试帖，读四书五经而外，无他学”^②。经学意识是士子知识结构的表现。近代封建科举知识分子的经学意识极其强烈，曾国藩镇压太平天国起义时，诅咒太平军“举中国数千年礼义人伦诗书典则，一旦扫地以尽”，号召凡读书识字者，“又乌可袖手安坐，不思一为之所也”^③。康有为著《新学伪经考》，顽固派叶德辉惊恐失声：“六经既伪，人不知书，异教起而乘其虚，岂非孔子之大祸？”^④都是利用知识分子的儒家思想道统，煽动他们助纣为虐。

① 《“五四”前的北大和“五四”后的清华》《文史资料选辑》第34辑第2页。

② 《清广译日本书派游学折》，《戊戌变法》（二）第222页。

③ 《曾文正公全集·文集》卷3。

④ 《与南学会皮鹿门孝廉书》，《戊戌变法》（二）第650页。

纲常意识是当时知识分子封建思想意识的核心，它包括忠、孝、节、义四个方面的内容。忠是对君主的忠诚，孝是对父母亲长的严敬，节是妇女对其丈夫的贞洁，义是朋友间的友信。孝是基础，忠是最高精神境界。节、义代表夫权和平行关系的伦理范畴，孝与忠则是这个范畴的起点和归宿，《礼记》说：“何谓人义？父慈、子孝、兄良、弟悌、夫义、妇听、长惠、幼顺、君仁、臣忠十者谓之人义。”①《孝经》认为：“孝始于事亲，中于事君，终于立身。”忠孝节义观是儒家伦理的骨干，儒家学派是集大成者，但也并不完全是它的独创。由孝推衍及忠，形成一个完整、均衡，而又相互制约的伦理体系，某种程度上也是原始血缘宗族观念与等级观念的逐步综合与发展。尤其是经过历代封建统治者的宣扬表彰，它不仅成为科举知识分子的沉重心理积淀，同时也是整个社会所推崇的道德习惯。比如贞节，明代洪宪年间规定，民间寡妇30岁以前亡夫守节，50岁以后不改节者，旌表门闾，免除本家差役，“著为条款，巡方督学，岁上其事；大者赐祠祀，次亦树坊表，乌头绰楔，照辉井闾。乃至僻壤下户之女，亦能以贞白自砥”②。明清时期所建节孝牌坊，上至通都大邑，下到穷乡僻壤，多如牛毛，不可胜计。戊戌变法时期的王照，政治上属于革新派，由于支持变法得到光绪皇帝谕令嘉奖，一时名声大噪，誉满京华。恰恰是这个王照，“有族人服内生子，照斥为非礼，不令入王氏谱”，“自居母丧，其妇亦孕……逼妇自裁”③。若在当今社会如此迫害妇女，必将受到法办，可是一百年前的中国却作为礼教佳话得到称颂。再如孝道，《孝经》是清代科举的必考科目，作用是非常明显的：“庶士子

① 《礼记·礼运》。

② 《明史·列女传序》。

③ 胡恩敬《王照》，《戊戌变法》（四）第34页。